

校點 重刊 通志

卷之三

藝文志

陇上学人文存

# 陶景侃 卷

陶景侃 著 颜华东 闫晓勇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陶景侃卷 / 范鹏, 王福生总主编 ;  
陶景侃著 ; 颜华东, 闫晓勇编选. — 兰州 : 甘肃人民  
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26-05063-7

I. ①陇… II. ①范… ②王… ③陶… ④颜… ⑤闫…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数理逻辑—文集 IV. ①C53  
②01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7346号

出版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李依璇

封面设计：王林强

## 陇上学人文存·陶景侃卷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陶景侃 著 颜华东 闫晓勇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7 字数 345 千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978-7-226-05063-7 定价：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主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焰	安文华	马廷旭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主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魏胜文 马廷旭

##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连辑 咸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 毅	张广智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主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连辑 夏红民  
副主任：张建昌 范鹏 高志凌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 《陇上学人文存》第五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	王三运	林 铎		
主任：	梁言顺	夏红民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彭鸿嘉	
委员：	管钰年	王永生	王福生	朱智文
	安文华	马廷旭	王俊莲	张亚杰
	李树军			

---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主编：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马廷旭

##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从集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 年卷) 的编辑出版工作, 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 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 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 《文存》年出十卷, 到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 则从 1949 至 2009 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 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 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 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 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 百卷巨著蔚为大观, 《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 传之后世, 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 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 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 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 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 年 12 月 26 日

## 编选前言

《陇上学人文存》的问世,实为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大幸事,近年来随着数十本入选著作的陆续出版,甘肃一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学科中卓著的皇皇巨著,逐步展现在读者面前。按照《文存》“总序”,总主编范鹏先生提出的人选标准:“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在我们的心目中,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陶景侃先生是一位理所当然的入选者。作为《陇上学人文存·陶景侃卷》的编辑,我们将尽心尽力地工作,力求将陶先生数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完整、全面、准确地呈现给广大读者,使其传之后学,发扬光大。

### 一、作者经历

陶景侃先生,1939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50年8月至1956年7月就读于无锡市辅仁中学(曾名为无锡市第二中学),这是一所教学条件良好、教师人才济济的学校,为他筑就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和培养了积极的学习态度及方法。他是这所学校的优秀学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数理化成绩尤为突出,这也为他日后教研数理逻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陶先生讲过,中学的学习生涯,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的法律系,1961年毕业。从1956年至1961年的五年学习生涯中,攻读专业倒并不费事,他爱好广泛,课外的大量时间,主要阅读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陶先生的大学生活很不平静,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政治运动,又是



在“生活困难时期”毕了业。但他还算幸运，虽定“立场动摇”，倒还未受任何处分，于是能侧身其外，利用学校搞“运动”而不管教学的时段，发掘北大图书馆书多、阅览室安静的潜力，悄然默默地借书、读书。只不过由于形势不同，就从文学历史艺术，从笛卡尔、休谟哲学，转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看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样的。他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还没有官方的全译本，只有郭沫若译其第一部分而出版的《德意志思想体系》。接着因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又追溯到贺麟先生翻译而在 1958 年第四次印刷的新书黑格尔《小逻辑》，直至 1961 年大学毕业之前，一直有兴趣于研究辩证法。但写了由领导分配课题的国际法方面的毕业论文，答辩毕业之后，既因生活困难岗位少，也因为政治表现的缘故，没有“国际”性的工作而分配到了甘肃省，其中似有“贬谪”的味道。但到甘肃后，再分配到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比分配到甘谷、静宁的两位同学好一点，（其中一位，后以郑州大学法学教授退休）”。他在检察院办了几年贪污、渎职等的“职务犯罪”类的刑事案，倒也业务为重、平平安静。不料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还要“砸烂公检法”，先是一锅端进了“学习班”，后来又改称为“五七干校”。实在没有任何把柄，又被再分配到以煤矿为主业的远郊区，在兰州市红古区法院工作，直至“四人帮”覆灭。适逢其时，兰州大学韩学本等先生筹备建立哲学系，陶先生走向社会，经历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也走上了最适合于他的“正道”。陶景侃先生于 1978 年底调入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之后，埋头苦干，潜心治学，在 1985 年 12 月任副教授，1993 年 6 月任教授，1993 年 10 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从 1978 年入兰州大学，到 1999 年底退休，2000 年上完那学年的课程，从事教育工作 21 年多。这一期间，陶先生认认真真地讲课，孜孜不倦地改进教学，准备着新教材、新课程，教学和科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师生中留下了良

好的口碑,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及追求。

## 二、教育和学术的环境

陶先生的人生起伏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中中国教育的沉沦。1966年“文革”伊始,就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高考制度加上了“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罪名,予以废止。从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间全国大学停止了招生,从1971年至1976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基本不考试,由所谓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录取学生,六年间总共招生不足百万,学制二至三年,教学也基本以“文革”的“斗、批、改”为中心,学习内容、学生质量没有起码的保障。这是近代以来世界教育史上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大事件,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到了1968年,“文革”之初兴起于中学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业已完成其政治使命,“文革”策划者的目标基本实现了,而“复课闹革命”又绝无可能,遂于这一年的年底,在全国范围形成了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在校的初一到高三共六个年级的学生,一次性地被全部“毕业”,是为后来所称的“老三届”,绝大多数中学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在教育史上同时成为创造世界纪录的“奇葩”,使当时的中国中学教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不堪回首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无疑是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的一声春雷,我国的高等教育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他的人生道路也实现了决定性的转折。

到兰州大学后,按照陶先生的学养与兴趣,起初他想搞西洋近代哲学,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就曾认真研读从培根、笛卡尔,到休谟、黑格尔的近代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哲学,连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



意识形态》等,颇有别致的理解。及至调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时,第一届78级的学生已经开课,但还没有逻辑课的教师,哲学系创建人韩学本先生,希望他先任教逻辑学,陶先生从此就走上了讲授和研究逻辑学的道路。其时,大学文科的逻辑课程内容,仍然主要是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传统形式逻辑,这对于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任务。第一次出去开学术会议,就是响亮的“逻辑要现代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吸引他走上教研数理逻辑的道路,使他在教研逻辑的道路上,欲罢不能,不仅干到退休,还直至当今。

在五十年代,中国的人文学术界中,逻辑学相对于许多其他学科而言,曾经一枝独秀,这与苏联的影响,特别和毛泽东的关注大有关系。1950年至1951年期间,苏联哲学界曾展开了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当时学术上也是“一边倒”的中国,自然也是紧随其后。从1953年开始,中国也开展了围绕逻辑学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虽经三年“困难时期”也未停歇,长达10年之久。为此,从1958年至1962年的《哲学研究》编辑部,出版了厚厚的三大本论文选集,收入了130多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颇具名气的逻辑学专家。这次大讨论对于我国的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走向与发展道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推动逻辑讨论,三联书店于1959—1961年出版了一套十本《逻辑丛刊》,其宗旨是普及逻辑学知识,推动逻辑学研究的发展,丛刊选印的是“中国历来出版的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的译本和著作”,其中有现代中国逻辑学家金岳霖的《逻辑》,近代引进西方逻辑的首倡者严复译的《穆勒名学》,王国维的译著《辩学》,以及可视作为我国介绍欧洲逻辑学的第一人、明代学者李之藻的译本《名理探》等,十分契合出版者的选书主旨。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高校文科许多系科都普遍开设了以传统逻辑为主要内容的逻辑学课程,普及了逻辑学的基础知识,培养和造就了一